

● 谭 帆

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



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

谭 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

谭 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70千字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本

ISBN7-5617-0431-3/G·204

定价：6.35 元

序

金圣叹确实是个“怪诞不经”的奇人、奇才。自明入清，因怪诞不经，处处碰壁，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只好绝意仕进。设馆授徒之外，一心读书著述，独喜为文学批评，对中国古来诗、词、文、小说、戏曲等各个种类的名著都想独出手眼，加以评说。他的计划不小，也已完成不少，但顺治十八年（1661）哭庙案一来，他竟被以倡乱罪处斩，只活了五十四岁，计划并未都完成。实在很可惜。

金圣叹生前即褒贬不一，死后还是如此。褒有过火的，贬也有过火的。贬得过火的有些实在太不近情理。金圣叹参加吴县诸生百余人乘清世祖死后在吴大臣设幕哭临致哀的时机哭于文庙，上揭帖请逐酷吏县令任维初，虽已难知当时详情，总还是有胆识的一种表现，县令正是有力量可以“管”他的地方主官。终于说他这一参加是犯了“倡乱”大罪，头颅果然被砍掉了。但竟还有人斥责金仍是清廷的奴才，死不足惜的。如果真是读过金的较多著作，较多理解他的全人，应该不会如此苛刻。简单地看待一位相当复杂而且在历史上起过不小作用，产生长远影响的人物，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很重要。去年为编《近代文学大系》中的两卷“文学理论”，发现近代文学时期却有不少论者非常推崇金圣叹，认为他非常了不起，开了批评的新风气。近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不少论者能非常推崇金氏，我感到恰与金的“怪诞不经”有关。怪诞就是对常轨的背离，实际便是一种新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金氏有在“岁试”文章中也“怪诞不经”，不怕冒“黜革”风险的勇气，有参加哭庙，请逐地方主官酷吏不怕被无限上纲杀头的胆识，应该承认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布衣终其身”的金圣叹来说，今天看来许有其不可夺的某种大节，把他的被酷吏

们用“倡乱”帽子虐杀改称为“遇害”、“牺牲”，我认为可以。看到写于顺治戊子年二月四日他的一幅字，写着两句话：“消磨傲骨唯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笔力劲健，意蕴沉郁。长揖中满怀悲愤，半酣时才得略发雄心。还是无可奈何，最终一发而头便落地。从这两句话里好像就能想像出金圣叹一生的悲愤、挣扎和苦难历程。他已只能用其文论著作来驰骋自己被压抑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意愿，留给他的已只有这样一条非常狭窄而仍充满着危机的小路，他给我们显示出的价值就只在这些未都完成计划的文论著作里。其实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他也早已预感到是未必可实现的：“诚使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胃吃饭，再将胸前数本残书——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书》）对这小小愿望越是觉得“无量幸甚”，实际反映了他对这种可能早已预料很难成为现实。果然不出所料。《绝命词》中他哀叹：“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再也不容他来完这些未竟之业了。他无比沉痛，酷吏们则正在畅快。

金圣叹诚然以文学批评名世，谈不上是政治家，但他的被斩杀是由于说他要“倡乱”，他的思想感情也自述偏在历来被侮辱被压迫者一面，而他自己则渴望着能有完成著作的自由。这仍与现实政治有一定关系，是客观的存在。晚年他即说过这样一段话：

“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余弟皆不惜。”读书写书不为荣居上位者歌颂，却一心想为自来辱在泥涂者昭雪，这还不要触犯当时那批封建统治者？我看不能把金圣叹称为一个纯粹的文学批评家，这样既不符合事实，反而是把他贬低了。没有他始终固执着的“怪诞不经”思想，就不会有参加哭庙的壮举，他就不会被杀头，也就没有了今天所看到的金圣叹及其历史了。

但这只是金的一面，虽然历史地看来，应是他较主要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即深受传统且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一面。

如果把他仍有的这类思想集中起来，例如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例如多次痛斥“犯上作乱”的行为，例如他说如非为圣人或天子而作书，其书即是“破道与治”的“横议”等等，那么他就是活脱脱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对也贬得过火就这样来的。反之，如果把他另一些思想集中起来也不顾及全部，例如他同情民生疾苦，痛斥贪官污吏，看到“一高俅”之外还有“百高俅”，108个好汉所以去梁山乃因“乱自上作”，天下无道则庶人应该敢议等等，又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不说《西厢》为淫书而乃“天地妙文”，那么他就是相当现代化的先知先觉，对他自然也就容易褒得太过。封建王权思想与礼教思想在他头脑里仍常起作用，并不奇怪，他就是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不同的是由于他没有多少凭借，又狂放不羁，为文怪诞不经，以致仕进无路，加以知识广博，对人民生活比较接近，所以就成为在内心和切身感受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文人颇不相同的另一种人。正统与异端，传统影响与切身感受，不断在他的头脑和著作里出现与碰撞，在复杂的斗争中，错综纠结，到头来切身感受还是占了上风，现实主义得到优势。他付出了悲愤、劳苦终至被杀头的最惨重的代价，赢得了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长久价值。他并不非常伟大，却会长留在文学史上。像他这样决心以全部精力和生命放在文学批评工作特别在小说、戏曲上，而且能提出不少如性格描写的创见来的人，历史上举不出别人能与他并论。

谭帆同志这部《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专著，对金氏在中国戏曲批评上的贡献及其特色从理论角度作了有价值有新意的探索，我读后深感欣喜。对金氏呕心沥血倾一生性命做出而且至今仍不乏借鉴、启发意义的实绩从各个各具特色的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总结，有必要也有意义。这种工作过去做得还不够丰富、细致，谭帆的辛勤劳动我认为有开拓、发展之功。

在金圣叹的全部文学批评中，对小说、戏曲的批评成绩最好，

小说方面以对《水浒》的批评为主，戏曲方面即以对《西厢》的批评为主。说是批评，其实中间即含有他自己的再创造成分在内。金氏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自觉和自豪感，而且还自信这并非自己一人的想法：

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同）

他自己这样感觉，乾隆年间周昂也早有同感：

吾亦不知圣叹于何年月日发愿动手批此一书，留赠后人。一旦洋洋洒洒，下笔不休，实写一番，空写一番。实写者，《西厢》事即《西厢》语，点之注之，如眼中睛，如颊上毫；空写者，将自己笔量，写自己性灵，抒自己议论，而举《西厢》情节以实之、《西厢》文字以证之。（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批注的评述）

正因为在金氏的评析中有许多借题生发处，而生发的又有不少在当时条件下是“怪诞不经”即反正统、反礼教、反虐煞正常人性的进步思想，所以他的批评就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有其创造在，有其“狂放”的主体作用在。这同过去一般的正统戏曲批评比便有了鲜明的特色。本书著者对这一特色不但能注意到并有着简要的阐述，在肯定其大胆地有所突破旧观念之处的同时，也同时指出其仍未完全摆脱因袭的重担。如《西厢》常被外观道岸的卫道者斥为“海淫之尤”，而他则大声反驳：

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有此天地，他中间便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人便是天地现身。

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段耳。细思此

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之间有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何自而来，便废却此身耶？（同上《读法》）而在同时，他又稍稍让了一步，亦说：

《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

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

本书著者对此指出：“在这种无法排解的矛盾之中，金圣叹对《西厢记》之淫的辨析虽然有着慷慨激昂的言辞，但最终还是显得较为苍白的。而这种苍白又是一种时代的标记，一种无法超越历史局限的时代性缺憾。”这样指出，我认为是比较客观持平之论。《西厢记》当然说不上是淫书。真正有害的淫书一味渲染动物性，毫无艺术价值，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乃是市侩贾利行为，不容把《西厢记》这样的作品作为档箭牌。

著者指出：金圣叹丰富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叙事理论体系，作出了前无古人，后鲜来哲的贡献，金圣叹的理论未限于过去一般的戏曲形态认识而有了较多的哲学思辨色彩，但由于重在文学方面的探索，很少同曲学、剧学的体系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以致对戏曲发展未能充分发挥影响。正如李渔所说，他主要是“得了文字之三昧”，而“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也”（《闲情偶寄》）。这都是中肯之论。

谭帆同志等跟我一道学习讨论过中国古今戏曲问题几年，他们是专治此学，我不过在聆听他们勤读苦学后各抒己见之后谈些管见，对他们实在未有什么具体帮助。现在他们都已在教学研究中做出很多成绩，并开始著书立说了，欣慰之余，但愿他们都振翅高飞，向博大精深处更上层楼罢。略读所见，寄以厚望，聊以为序。

徐中玉

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

引 论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金圣叹撰成《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件大事。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问世,标志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对《西厢记》的欣赏和流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金圣叹之前,中国戏曲理论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曲辞创作理论和表演理论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推进了戏曲文学创作和舞台表演的进一步繁荣。然而,在戏曲理论的建构和戏曲批评的视角上,对戏曲艺术独特的故事本体的阐发则相对薄弱,戏曲文学的欣赏也大多停留在曲辞的品鉴之中。金圣叹以其独特的批评眼光和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对《西厢记》这个历代传颂的文学瑰宝作出了深刻的品鉴,并自觉地在戏曲文学理论中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关于戏曲故事本体的创作思想,这无疑是对传统戏曲理论的一种补缺,同时更是对戏曲理论批评的一次推进。

对于这样一部戏曲理论批评名著的研究相对地说还是比较薄弱的,虽然《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流传非常广泛,理论研究也从未断绝过,但从戏曲理论批评角度对其作出深刻把握与公正评价的还并不多。清代以来,往往从曲学角度对其肆意讥评,近数十年又多从思想价值出发作社会学的评估,人们的研究失落最多的恰恰正是《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最为精彩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戏

曲文学的叙事理论。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理论遗产。

鉴于此，本书的任务便主要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思路大致如下：第一、二章是对金圣叹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主体研究”，揭示金圣叹批评《西厢记》的批评主体特征；第三至第七章是《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本体研究”，着重分析金批《西厢》的外部特征和内在的理论思想；在此基础上，从第七到第十章则对金圣叹的戏曲理论批评作出价值评估，包括清人的评述、金圣叹与《西厢记》评点系统之关系以及金圣叹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的历史地位。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迄今还未有一部完整的研究著作，这与金圣叹在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本书对这一空白的填补是希望学界的进一步重视，以推进戏曲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当然，书中的缺点定然不少，对此，笔者祈盼着学界专家同好的赐教。

00811/25

目 录

序徐中玉

引论 (1)

第一章 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活动

第一节 金圣叹：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家 (1)

第二节 金圣叹文学批评著作的成书年代 (6)

第二章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观

第一节 金圣叹文学批评的两组序列 (13)

第二节 “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 (16)
——金圣叹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第三节 “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 (19)
——金圣叹论文学批评的“解义性”

第四节 “鸳鸯既绣出，金针亦尽度” (24)
——金圣叹论文学批评的“导向性”

第三章 金圣叹的《西厢记》批评

第一节 金批《西厢》的体例、版本和特色 (31)

第二节 金批《西厢》的哲学美学基础 (46)

第四章 关于《西厢》之“淫”的理论辨析

——兼谈金圣叹对戏曲本质特征的认识

第一节 金圣叹的戏曲本质论……………(52)

第二节 金圣叹辨析《西厢》之“淫”的矛盾心态…(54)

第五章 金圣叹论《西厢》人物及其理论总结

第一节 金圣叹的“才子佳人论”……………(58)

第二节 “心、地、体”辨识……………(61)

——金圣叹论性格及性格的塑造方法

第三节 “为莺莺添神采耶？”……………(71)

——金圣叹论戏曲人物的组合关系

“人物论”附识：个性耶？类型耶？……………(79)

第六章 金圣叹论《西厢》结构及其理论总结

第一节 说“三渐”……………(84)

——金圣叹论戏曲结构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关于戏曲结构的有机整体性……………(91)

——《第六才子书·后候》总批释义

第三节 戏曲艺术的叙事方法举隅……………(101)

“结构论”附识：创作的自觉性性与结构的严整性…(107)

第七章 金圣叹论《西厢》语言及其理论总结

第一节 金圣叹论《西厢》语言的“描述性”……(112)

第二节 金圣叹论《西厢》语言的“性格化”……(116)

第三节 金圣叹论《西厢》语言的“动作性”……(120)

第四节 金圣叹戏曲语言论的理论得失……………(124)

第八章 清人批评“金《西厢》”述略

第一节 史迹的缕述……………(127)

第二节 李笠翁的评述与梁廷楠的反批评……………(130)

- 第三节 晚清批评“金《西厢》”一览……………(134)
- 第四节 几部重要的金批《西厢》批点本……………(140)

第九章 金圣叹与《西厢记》评点系统

- 第一节 《西厢记》评点史略……………(150)
- 第二节 《西厢记》评点的内在系统……………(157)
- 第三节 《西厢记》评点系统的“艺术积淀”……(165)
- 第四节 金圣叹与《西厢记》评点系统之关系…(168)

第十章 从金圣叹看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 宏观体系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形态的历史演进…(172)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戏曲观念的逻辑发展…………(181)
- 第三节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三大体系…………(185)
- 第四节 金圣叹戏曲理论的历史地位(代结束语)
……………(187)

后记……………(192)

第一章 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活动

第一节 金圣叹：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家

一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在清代享有盛名，人们赞其“才名千古不沉沦”，^①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就如李卓吾、钟惺之辈也是“望尘莫及”^②的。

但是要了解金圣叹这样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生平遭际，却是颇为困难的。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由于并未跻身于仕途，在政治上少有业迹而常常会遭到官书正史之冷落。更何况象金圣叹这样被清王朝视为“贰臣”的文学批评家了。然而，金圣叹毕竟才名籍盛，声誉蜂起，在正统的史誌官书之外，众多的文集、野史倒有较多记载。不过这些记载大都零星杂乱且鱼龙混杂。赞誉而溢美者有之，毁冒而失实者亦有之，甚至如“野狐附身、灵鬼再世”之说亦充杂于其间。

近代陈登原氏勾稽诸多文集野史，参阅多种评述，辑成《金圣叹传》一书，^③搜求之功甚勤，所论亦颇有公允之处。今参照陈氏之传，并间入个人所见之资料，将金圣叹之生平略加勾冗如下。

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吴县人。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陷入轰动一时的江南“哭庙案”而被清廷所杀，时

年五十四岁。

金圣叹少为吴县诸生，补博士弟子员；因“岁试之文，怪诞不经”而被“黜革”；④后“绝意仕进”，除了与友朋谈论之外，“惟兀坐贯华堂读书著述为务”。⑤圣叹平生从未有过半点功名，以白衣士大夫终其一生。

金圣叹的一生是在较为平淡闲逸的情况下度过的。他不象一般的古代文人，或干之青云，浮沉于宦海，或书剑飘零，行踪无定。而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作为明代遗民，入清以后“绝意仕进”，这是明末清初一些正直文人学士的普遍情况。然而金圣叹的这种不予合作的态度其实与政治并无太大的关系。在他的杂论、谈片中，虽有着颇为激愤的言辞，也并不缺少富有民主性因素的思想火花。但这还不能与顾亭林、黄梨洲辈相提而并论，他的思想对现实政治并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他在政治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因而除了“哭庙”之举以外，我们几乎难以发见金圣叹与现实政治相联系的任何踪迹。质言之，金圣叹不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性质的人物，而是一个以文学批评家的形象而立身名世的。

在金圣叹的平生遭际和主要活动中，他对现实生活有着较大影响的是两项工作，一是设馆讲学，二是品诗论文。廖燕曾在《金圣叹先生传》中评述其讲学之盛况：

“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缙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⑥

当然，金圣叹的主要活动乃是著述和文学批评。由于他没有官场的拘束，故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他所心爱的事业。从他的诗文杂著来看，金圣叹一生著述除了文学批评以外，大概研读佛学乃是他的又一兴趣之所在了。然而金圣叹对佛经的研习，并未陷入顶礼膜拜的境地，而是将它作为哲学思想来探索的。

二

金圣叹的主要活动是文学批评，他从事这项工作几乎是与他的生命相始终的。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中，圣叹曾讲述了这样一则逸事：

“吾年十岁，方入私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悟如也……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花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二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甚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常读。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⑦

可见，在垂髫之年，金圣叹便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这以后的第二年，金圣叹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批评生涯：

“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⑧

从《水浒传》的批文来看，金圣叹此语似乎有所夸张。但不管此语是否确凿，总之，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活动在少年时期便跃跃欲试，初露锋芒了。

金圣叹的平生遭际是穷厄的，文学批评活动占去了他生命的大量时光，他整整一生都在呕心沥血地从事这项工作，直到其生命的终止，在晚年，金圣叹犹孜孜不竭在追求着：

“诚使天假第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⑨

然而现实并未承他之美意，他不幸遭难，被迫中断了他那未竟的事业。也许是圣叹之死过于仓促而又突兀了，他没能来得及完成批评“六才子书”的宏大计划，而这也给中国文学批评史留下

了颇为遗憾的一笔，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序》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已亥刻《唐才子书》，……书成，即评《天下才子必读书》，将以次完诸才子书，明年庚子《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死。”（着重号引者加）^⑩可见，“诸才子书”的批评已经列入了他的既定计划，而况金圣叹此时还未至耄耋之年，他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已趋向于成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过早消逝，在他的文学批评中留下了一段凄凉的空白。

金圣叹从事文学批评，有时还是在与朋友之间的抵掌谈论中形成的，他的相知交游大都是一些不达文人，但对文学批评却颇有同好。在圣叹与他们的书札往还中，我们能不时地看到有关文学批评的讨论文字。在这些人中，有徐增，许庶庵、王道树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这样评述徐增的文学批评：

“增字子长，长洲人，所录《唐诗》三百余首，一一推阐其作意，其说悠谬支离，皆不可训。……增与金人瑞游，取其《唐才子书》之说，以分解之说施于律诗，穿凿附会，尤失古人之意。”^⑪

综观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活动，他在文学批评史上是较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大致包涵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金圣叹是一个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家。他从二十来岁便制定了他文学批评的宏大计划，而其一生也便就是在不断地完成着这项事业。由于他不是在政事之余暇从事这项工作，因而他没有官场的拘囿，在他的批评文字中也少有迂腐的官场陋习，也并不以俗文学为末流。他是随兴所致，把文学批评看成是一种人生的事业。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序言中，金圣叹曾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消遣”，但这种“消遣”却是不能望文而生义的，他尝言：

“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
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